

ISBN 7-119-05111-5

¥14.00元

闻一多全集（全11卷）（第11卷）

（中国当代研学丛书）

中国当代研学丛书

文化

闻一多与中国学术史

闻一多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中国当代研学丛书 |

文化

闻一多与中国学术史

刘殿祥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闻一多与中国学术史 / 刘殿祥著.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0. 3

ISBN 978-7-5117-3775-5

I. ① 闻…

II. ① 刘…

III. ① 闻一多 (1899-1946) — 文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85996 号

闻一多与中国学术史

出 版 人: 葛海彦

责任编辑: 刘 溪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5.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作者简介

刘殿祥，分别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89年起任教于大同大学（原雁北师范学院），现为大同大学文学院教授，云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云冈文化研究，主持科研项目7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项，山西省和四川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项，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校级项目2项。出版著作《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闻一多“死水”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主编《闻一多代表作》《杨振声代表作》（华夏出版社），担任《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副主编，另参编学术著作10余种。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光明日报》《中国文学研究》《江汉论坛》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获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中国闻一多基金会颁发的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山西省第七次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出版人 葛海彦
责任编辑 刘 溪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引言	1
第一章 诗歌与学术之间	5
一、诗歌中的学术 5	
二、从诗歌到学术 20	
三、学术中的诗歌 31	
第二章 学术中的史家意识	48
一、文化人生历程中历史意识的生成 48	
二、学术研究历程中历史意识的成熟 57	
第三章 学术研究中的学术史意识	76
一、闻一多的学术史意识 76	
二、闻一多与古代学术文化史的关系（从先秦到宋明） 80	
三、闻一多与清代学术 101	
第四章 “国学”意识的历史生成	122
一、从“汉学”到“中学” 122	
二、“国学”话语的兴起 133	
三、闻一多的国学意识历程 142	

第五章 现代学术语境中“国学”的共生结构·····	152
一、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法则”	152
二、北京大学的“整理国故”与“疑古”思潮	166
三、“美国化”清华的国学研究院	174
四、清华园的人文环境和现代思想格局	190
五、清华学派的形成和“释古”研究	203
六、学术个性与学术流派之间	215
结 语 ·····	234
参考文献 ·····	246
后 记 ·····	256

引言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以郭沫若、闻一多为代表的诗人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开创了诗歌的全新局面，而且以他们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学术化倾向；而以郭沫若和闻一多为代表的一部分现代诗人如胡适、朱自清、冯至、陈梦家、何其芳等同时又是现代学者，或在新诗创作的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或从前期的诗歌创作转向后期的学术研究，以诗人的特性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带来了新风格和新气象。中国现代诗人兼为现代学者，或从现代诗人转变为现代学者，这成为现代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从创作到研究、从诗歌到学术、从诗人到学者，诗歌与学术的转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作家和诗人的消失，另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现代学者的产生，诗歌与学术的转化之间，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代和文化传统中，自有意味深长的地方，不仅关涉诗歌和学术本身的文化转化问题，而且关涉诗人和学者的人格、精神和思想的变迁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转化和变迁中，这既有趣味又更有意义的现象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深刻内涵。

由“学”而“诗”，从“诗”到“术”，体现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文学创作本就是构成学术研究的对象，学术研究可以促进文学创作，创作的艺术思维和创作经验能够开创出全新的学术研究的境界和范式。中国学术史上本来就有作家从事学术研究的传统，但古代文学和学术没有严格分科界限，文史哲都浑然一体，文学几乎就是学术。而现代分科后，人类思维明晰化，艺术和科学分途发展，文学和学术各司其职，艺术为创作，学术成客观的研究。只有在现代文化格局和学科分化中，文学家和学者才具有鲜明的区别。而只有在现代文化格局和学科分化中，诗人转变为学者才具有了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

现代诗人学术研究的取向分四个方向：一是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的整理、鉴赏和研究，如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林庚、何其芳；二是外国文化和文学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如郭沫若、冯至、戴望舒、穆旦、曹

葆华；三是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如胡适、郭沫若、冯至；四是对印度文化和文学、佛教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如胡适、金克木、废名。

而以已经成就了的诗人指向学术研究，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学术反观其诗歌的艺术精神世界，会有更为深厚的文化感受和精神体验；另一方面，诗歌创作的经验和天然的诗性思维无疑给中国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使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在现代学术史上增加了诗人型的学者，一改传统学者皓首穷经、刻板迂腐的形象，而出现了思维活跃、精神勃发的现代学者，尤其于学术世界中平添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而他们更以特有的艺术创造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无论是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还是在中国学术史上特别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正是在此基点上展开闻一多对古典学术的研究，力图发现现代诗歌和古典学术研究之间关系的意义，以重新认知中国现代诗歌和中国现代学术的特征。其研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现代诗歌史价值。通过对具体诗人诗歌创作和他们作为学者的古典学术研究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诗歌创作中所蕴含的学术含量和文化底蕴，即揭示出“诗中有学”的特征。“以学为诗”本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尽管文学革命后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白话自由诗中“学”的含量愈来愈稀薄，但因为第一代现代诗人基本都受过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以及随后有意识地从从事古典学术研究，所以他们的诗歌中仍然保有深厚的学术含量和文化底蕴。这一点不仅仅使我们认知现代诗歌的新特质，而且也提供了反思现代诗歌创作问题的参照，对当下新诗的创作具有启发和重要参考价值。

2. 中国现代学术史价值。现代诗人转变为学者后，诗歌创作的经验和天然的诗性思维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就使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在现代学术史上增加了诗人型的学者，一改传统学者皓首穷经、刻板迂腐的形象，而出现了思维活跃、精神勃发的现代学者，尤其于学术世界中平添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而他们更以特有的艺术创造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了更为特别的学术价值。本课题即重点阐发现代诗人在古典学术研究上的贡献和他们的诗意化的学术研究对于中国学术史的价值。

3.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认知价值。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后开始的，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应该指向两翼，一是新文学的创作，二是古代文学的现代化。中国现代作家多数既是新文学的创作者，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古代文学的现代化正有赖于现代学者以现代视角和方法去研

究将古代文学推向现代化。现代诗人们在新诗创作的同时进行古代文学、古代诗歌研究，他们从创作和研究两个方面推进着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的现代化。通过阐发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可以更具体深入地认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全面”。

4.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的价值。身兼现代诗人和现代学者双重身份的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冯至、何其芳等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和人格特征，而这种精神变迁和人格特征正具体化地体现在他们在诗歌与学术之间的选择中。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从古典文化和学术中涵养出来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致力于诗歌的革命和新诗创作，但古典学养基础和传统文化的情结使他们对古代文化、古代文学、古代诗歌始终不能忘怀，不仅常潜心于诗歌创作，而且常情不自禁地进入古代经典的研究中。这样，他们在精神上走过了一条从古代到现代、从现代返归古代的文化旅程，同时也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变迁轨迹，影响了他们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的形成。在诗歌与学术的互动关系中深入，可以探索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文化人格特性，对于深入认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命运会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这是朱自清按照闻一多主要业绩进行论定后我们对闻一多一贯的认定。尤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时高度评价了闻一多不怕牺牲、“拍案而起”的民主斗争精神并号召写“闻一多颂”，更突出了闻一多的政治斗争业绩和政治人格。对一个如闻一多这样的具有多方面业绩的人物进行概括，难免陷入片面性，因为任何一种抽象和概括都必然以牺牲其他属性为代价。当我们说出“对象是什么”的时候，就排除了“对象不是什么”的特性，但这“不是什么”里面，固然有确实的“不是什么”，但也许还包含着对象的“是什么”而对对象的认识有所遗漏。应该说，从闻一多全部的业绩看，闻一多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史、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中国现代教育史特别是现代大学教育史、中国现代艺术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和人格演变史上，都既有杰出的贡献，又富有相当的典范意义，也就是说，闻一多不仅仅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闻一多一生从外在的现实身份看，基本上是从学生到大学教授，终其一生都基本生活在学院、书斋和文化中，由此自然提升出他的文化身份。但学院、书斋和文化并没有完全压制闻一多诗意化的创造力，更没能限定闻一多的精神扩展和思想的辐射力，他在常规的学术研究活动过程中突破了单纯的“学者”角色，思想和精神既指向历史，又指向社会现实，在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的沟通对照

中体现出他独特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力量。“学者闻一多”，这是我们基于闻一多杰出的学术研究贡献而对他文化身份的一种认定，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即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内容。当把闻一多定位于“学者”时，一方面，主体的“学者”身份指向或标明了他客观的学术研究成果，凝集于12卷本《闻一多全集》中的皇皇八卷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论著是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另一方面，闻一多作为学者，有着超越于一般学者的更为丰富的含义，闻一多的“学者”中包含了他全部的现实感受和文化精神，含纳了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现代革命、现代学术、现代教育、现代艺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各个层面的内容，有些本就是 he 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有些是作为精神底蕴体现于学术研究中的。“学者”所指的大部分学者单纯就是一个“学者”，学术研究既职业化又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趋于技术化，学术的职业化和学术操作中的技术化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典型的特征。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学术何为”和“学者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学术的单纯实用化和学者的视学术为谋生手段的答案与问题本身还是有所偏离的。以学术研究为职业和在研究中进行必要的技术操作，这同样表现在闻一多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但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中从根本上超越了学术的职业化和技术化，在学术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事实上回答了“学术何为”和“学者的使命是什么”的问题。本书主旨就是要揭示出闻一多作为学者而不同于常规意义上学者的特质，要说明：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学者同时担当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学者为中心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诗人、文化史家和现代思想家的维度，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中表现出诗性创造思维、文化史的穿透力和现代思想家的深度，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精神担当起中国文化的“杀蠹的芸香”的使命。这是闻一多作为现代学者的特质，更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思想的归宿。本书即以此立论，阐述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变和他的古典学术研究与中国学术史的联系，最终说明他的古典学术研究中的诗意化思维、文化史家意识和现代思想家的文化价值，落实在闻一多作为“杀蠹的芸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思想价值取向中，标示了闻一多作为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

第一章 诗歌与学术之间

诗歌属于艺术，学术归于科学。闻一多创作诗歌，以《红烛》《死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他进行学术研究，更以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成果奠定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诗人与学者，闻一多一身二任，在分属于艺术和科学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两大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表面看，闻一多先为诗人，后转变为学者，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呈现为时间上鲜明的先和后的状态，但实际上，闻一多的精神始终自然而自由地驰骋于诗歌和学术之间，固然表现为从诗歌到学术、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化，但同时还存在着作为诗人的一贯性和作为学者的持续性，即他的诗歌创作积淀着学术文化，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体现着诗人的本性。当我们说闻一多是诗人时，他是一个学者型诗人；当我们说闻一多是学者时，他是一个诗人型学者，诗人和学者、诗歌与学术在闻一多的精神和文化世界中实际上是统一的。闻一多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不仅在于他创作诗歌，而且在于他具有一种诗性的思维，其诗人的特性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历程中。事实上，闻一多一生都处于诗歌与学术之间，不是简单地以一贯说法“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变”能够概括的。诗中有学，从诗到学，学中有诗，是闻一多在诗歌与学术之间的最大特征。

一、诗歌中的学术

属于艺术领域的诗歌和归于科学范畴的学术，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从更广阔的人类文化角度，艺术和科学本来就有相当的联系。而学术研究对象如果属于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和诗歌就更加靠近。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并没有绝对的界限。首先从诗歌创作机制看，任何诗人在创作之前都要有一定的学养基础，不仅学习前人和别人的诗歌创作经验和从已有诗歌中吸收诗歌艺术营养，而且要博览广收人类文化中各学科和各方面的知识，以作为诗歌创作的必

要知识准备。没有多方面的知识基础和丰厚的学养积累,即使天才诗人也不可能凭空创作出作品。艺术家、诗人固然不是通过学习而通往艺术、诗歌的“象牙之塔”,尚需要一定的天赋、感觉能力和对现实人生的体验,但没有对以往人类文化、艺术、诗歌的学习,仅仅通过艺术天赋、感觉能力和对现实人生的体验,不仅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且连基本的创作能力都不会具备。其次,从诗歌创作过程看,诗歌作为抒情的语言艺术,诗人要把自我所感受和体验到的个性化的情感、思想、生活表现出来,就需要调动长期积累的精神的和艺术的储备,包括最基本的语言和艺术表现方式,一方面需要自我的创造,但另一方面创造也需要有所凭借。诗歌创作的过程是自我学养的外在化、对象化过程。再次,从诗歌创作成果看,完成了的诗歌作品在表现具体对象的同时,实际上包含着或积淀了诗人精神范围内的文化底蕴,以不同诗人学养的深浅而表现在诗歌中的文化底蕴也或深厚或浅薄。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就可以看到诗人文化知识和学术素养的深浅,每一首诗歌都必然体现着一定的学术文化含量。最后,从诗歌接受角度看,诗歌作品及其诗人往往又会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诗歌一旦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原本分离的诗歌和学术几乎可以合二为一。所以,诗歌中包含学术,就为本题中的应有之意,以此认知可以首先肯定闻一多诗歌中的学术。

研究闻一多的学术文化,首先应该把他的诗歌作为进入他的学术殿堂的入口,因为闻一多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入口就是诗歌。而他即使在诗人时期,学者的一面已经开始逐渐生成,其诗歌中的学术鲜明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闻一多诗歌创作中所包含的深厚学术素养,二是闻一多在诗人时期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这实际上也构成了闻一多作为学者的生成机制,他是通过诗歌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进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诗歌及其诗性思维伴随了他整个学术历程。闻一多的学术文化既然是发端于诗歌的,那么他的诗歌就体现出鲜明的学术文化意识和学术化特征。

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学术文化含量以他长期的学养为基础,从《红烛》和《死水》中的诗歌及一些集外诗歌可以鲜明地感受到闻一多深厚的古典诗歌、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的学术素养。闻一多生于1899年,中国尚处于传统社会,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全社会的价值取向仍然趋于读书举业,加之闻一多的家庭属于中国传统的“耕读世家”,祖上多有科举得中而进入仕途者,其祖父虽然没有考中,但寄希望于子孙,对自己的不第耿耿于怀之余,“以为书香不继,大是恨事。每于试后见族有报捷者,终夜涕泣,又强自解曰,有孙可弄,岂无后望。

爰筑书室于屋侧，延名师课孙辈”^①。这样，闻一多祖父在闻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闻一多稍长后在家庭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开始学习中国传统典籍。当然，最初的教育内容一是启蒙读本，二是科举考试内容的初步准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闻一多的学习内容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八股制艺而扩展到史部、子部和集部，尤其开始从私塾教育转向新式学堂，在传统典籍的学习中增加了“新学”内容。但在启蒙教育阶段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典籍的熏陶不仅构成他知识结构的基础，而且内化为他根深蒂固的文化情感，所以，在随后的求学过程中，正规的学习内容为“新学”，但闻一多自己却在正式学业之余主要投入中国古典诗文和古代文化的学习中。1913年冬，闻一多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开始了他在清华长达10年的求学历程。在此期间的学习内容可分两大板块：一是清华学校的课程体系，包括英文、数理化、生物、地理、历史等现代学科，以英文为主；二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课，为中文课程，其中主要为闻一多自己选择研习的内容。当时学生重视英文课程而轻视中文课程，闻一多还特作文批判，批判中文课堂的“僑骗欺诈，放僻嚣张，丑态恶声，比戏院，茶馆，赌博场还不如”的状况^②，所以，闻一多自己在课余投入大量精力学习传统文史，特别重点研读古典诗歌，以为传统典籍中“《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亘万世而不渝，胪万事而一理者，古学之为用，亦既广且大矣”。带着这样的认识，闻一多针对清华学校“以预备游美之校，似不遑注重国学者”的教育现状，“不忘其旧，刻自濯磨”，志要“振兴国学”！^③我们从闻一多在清华时留下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和日记中可以看到闻一多在古代典籍和古典诗文学学习内容的广泛和深入。如《二月庐漫记》中，闻一多阅读范围涉及古代文化各个领域，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特别都有自己的阅读心得和评价。当然，闻一多的研习内容不仅有古典诗文，而且包括了西方文化。现存他1919年1月到4月的日记中提到的阅读书目中西并进，古典文化方面的有《日下旧闻考》《文选》《史记》《类纂》《清诗别裁》《明诗综》《元诗选》《宋诗选》《全唐诗》《八代诗选》《诗经》等；西方文化方面的有《罗马史》《希腊史》《旧约

①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② 闻一多：《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③ 闻一多：《论振兴国学》，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3页。

故事》《天演论》《千年进化史》《英文名家诗类纂》等。^①单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看，闻一多的阅读范围从晚近的清诗一直上溯到唐诗，包括八代以至《诗经》，囊括了中国诗歌史，吸收了历代诗歌的艺术营养。及至留学美国后，闻一多也多带中国古典诗歌书籍，虽然主修美术，但钟情于中国文学、中国诗歌，出国不久，已经完成陆游和韩愈两诗家的研究，“现已作就陆游、韩愈两家庭研究，蝇头细字，累字盈寸矣”^②。闻一多经常和同学带一本《十八家诗钞》去公园读杜甫、李白、苏轼、陆游等。^③这样，闻一多从启蒙教育开始到清华大学读书以至出国留学的整个求学过程，一以贯之，持续着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诗文的学习，形成他知识结构中至为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古典诗歌学养基础。与此同时，闻一多开始诗歌创作，先是旧体诗，文学革命运动后转向新诗创作，在新诗创作的探索中，从自由诗转向新格律诗的创作。无论是旧体诗，还是新体诗，都可以在诗歌中看到 he 此前或同时的学养成分，诗歌中包含着闻一多的学术文化因素。早期所作古典诗文结集为《古瓦集》，就诗歌部分更体现了“以学为诗”的特征。这里的“学”既指 he 初试旧体诗写作时对古诗的袭用，也指 he 把自己所学的古代文化融入诗歌内容中。如《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读项羽本纪》《自言子文学书院射圃谒言子墓》《寻桃源石屋二涧皆涸溯石屋上游乃得水因濯足焉》《维摩寺》等咏史诗，当然立足于 he 对古代人物和事迹的了解而以此抒怀，这里涉及李陵、苏轼、项羽、言子、陶渊明、维摩诘等人物典故。如《读项羽本纪》：“垓下英雄仗剑泣，遥遥泪湿乌江荻。早知天壤有刘邦，宁学吴中一人敌？”短短四句，把项羽生平遭际、项刘争锋、垓下战役、当时天下大势和项羽作为英雄的悲剧都表现了出来。还如《七夕闺词》：“卍字回文绣不成，含愁泪滴杏腮盈；停针叹道痴牛女，修到神仙也有情。”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民间传说和历史文化的多种背景知识，如古代为吉祥象征的卍字、诗歌中的回文锦、牛郎织女传说、道教和神仙传说等。创作新诗之前，闻一多还写过多篇赋体作品，如《马赋》《松赋》《招亡友赋》《清华体育馆》《清华图书馆》等，

① 闻一多：《二月庐漫记》《仪老日记》，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428页。

② 闻一多：《闻一多致1922年8月致父母亲信》，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③ 闻一多：《致1922年9月1日致梁实秋、吴景超信》，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虽然为咏物写景，但赋中所铺陈更多包含着古典文化意蕴和闻一多的学养积累。^① 旧体诗创作的传统本就是讲求“无一字无来历”和“借他人酒杯浇自我胸中块垒”而多用典故，诗歌更见诗人的学养基础和学术积累。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首倡“诗体大解放”，打破格律束缚，废除用典，“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② 新诗代旧体诗兴起后，最初的自由诗如胡适所言诗体解放，不押韵、不对仗、不求平仄、不用典故，直抒胸臆，诗歌语言使用白话文，但随之也在新诗中流失了古典诗歌所特有的学术文化含量。闻一多转为新诗创作后，一部分诗歌在内容和表现上也流于新式浮浅，但他毕竟有着深厚的古代诗歌艺术修养和扎实的古代文化修养基础，所以大部分诗歌中都体现出他的学术文化含量，可见出“诗中之学”。

闻一多的诗歌中的学术文化含量自然体现在诗歌创作机制中（前述他的学养基础）、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在创作中调动了他的学养积累）、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在具体诗歌文本直接可以见出学术文化含量）、体现在他的诗歌被欣赏和研究过程中（读者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接受和研究其学术性特征）。在此，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把握闻一多新诗中的学术化特征。

诗歌内容上，闻一多多有诗歌取材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事迹，包括神话传说，他在自己的古代文化知识结构中经过选择而提炼出最能够表现自我情思的古代文化和历史人物事迹，构成了他厚重的诗歌内容。这不仅见出他的学养，而且见出他的学力，更见出他把学术文化诗歌化的创作能力。而这些历史文化的内容不是单纯作为他知识结构的层面存在，仅仅作作为知识结构的一个层面而存在的历史文化是死的知识，而闻一多在诗歌创作中不是搬用而是化用学术内容，在诗歌化用的创作过程中有效地激活了以前所掌握的历史文化和人物事迹。学习内容的诗歌化实际造成了诗歌的学术化，在诗歌中包含了厚重的学术文化含量，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最为典型的是《红烛》中的《李白之死》，取材于李白“捉月骑鲸而终”的传说故事，闻一多以气势宏大的诗笔，借这个传说故事高歌李白的“诗人底人格”。李白本自喻“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闻一多依据历史和传说故事进行了大胆地想象，淋漓尽致地描绘了

① 闻一多早期文言旧体诗文集自编为《古瓦集》，后发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新版《闻一多全集》收录一部分。闻惠编注有《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2页。

李白醉酒和自蹈池水、捉月而死的情形，更出神入化地表现了李白醉意朦胧中的心理活动和对那“清寥的美！莹澈的美！”的月亮的向往。更为突出的是，闻一多通过李白之死的描绘，借李白之口，点化出异常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全诗充溢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和中国文化的美。诗歌一开始，龙烛燃尽，杯盘狼藉，客人云散，而主人醉倒。李白在醉眼朦胧中，思绪飞扬，看见月亮，想象为“广寒宫里的仙娥”，而自己则不过为“戏弄黄土的女娲”“散到六合里来底一颗尘沙！”在这里，闻一多一方面运用了“女娲造人”的神话，另一方面化用了李白自己的一首诗歌：“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如沙尘。”又取典籍记载中李白的出身和名字的来历：“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闻一多原注）诗中让李白对月抒怀：“谁不知我是太白之精？我母亲没有在梦里会过长庚？”因而引月亮为同族。像这样把李白的现实感受、神话传说和李白自己的相关诗歌融为一体的写法，在全诗随处可见，是闻一多对历史文化知识融会贯通后在诗歌创作中挥洒自如的运用。与《李白之死》相类似的有《剑匣》，叙写一位古代“盖世的骁将”在战争失败后偃旗息鼓，退隐民间后致力于雕刻自己的剑匣，在上面精雕细刻了一幅精美的中国历史文化图案。从闻一多所描绘的剑匣图案的元素看，包容了中国历史中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文化要素，体现了独有的中国文化美。如所用雕刻材料有象牙、墨玉、金丝、银线、玛瑙、珊瑚、琥珀、翡翠、琉璃、螺钿、蓝珣玉、紫石英等，这些虽然为物质性材料，但已经沾染了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而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载体；闻一多在艺术中驱策这位将领运用这些中国特有的材料在剑匣上面雕刻出中国特有的文化形象，如白面美髯的太乙、三首六臂的梵像、弹奏古瑟的瞎人、化为蝴蝶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等，熔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于一炉，点缀了美好的爱情传说，几乎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全貌。其中还穿插着李广射虎、李白断水、高祖斩蛇、霸王别姬的历史故事。“剑匣”雕刻的中国文化含量正是诗歌的中国文化底蕴，当然体现了闻一多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长期的积淀。闻一多出国留学后，思家念国，升腾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美国时创作了一系列想念祖国的诗歌，回国后创作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爱国诗，而这些诗大即取材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特有的物象，如他在美国写的《孤雁》《忆菊》《红豆》组诗，同样基于闻一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对民族文化象征物的透彻把握而选取了“孤雁”“菊花”“红豆”这样具有文化含量的意象。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为“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诗歌在表现“文化上的爱国主义”时主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在诗歌中集中描绘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化历史。而要表现“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当然首先要有对